

特朗普策動削弱美國軟實力的「文化內戰」



焦點縱論
劉兆佳

今年5月，最先提出和普及化「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政治概念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與世長辭。在他離世前夕，奈還於3月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哀嘆美國的軟實力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已經終結。可以想像，奈是含憾而終。在其文章中，奈特別強調特朗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外交政策猛烈衝擊美國的自由價值觀和制度，因而大幅削弱美國在世界上的軟實力。

以丹麥哥本哈根為總部的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日前發表「民主感知指數2025」（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2025）的調查報告。該調查在4月進行。調查發現，過去一年全球對美國的觀感急速惡化。在受調查的100個國家中，有82個國家對特朗普的看法負面，對美國的淨印象評分從去年的22%降至−5%，顯示對美國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數量高於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數量。

美「軟實力」正急劇萎縮

從歷史角度看，美國在全球的軟實力的急速萎縮，固然與美國的損人利己的「美國優先」政策、美國縱容以色列在加沙濫殺無辜和美國單方面悍然向全世界發動關稅戰有關，但恐怕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為關鍵的原因是，美國那套被美國人長期奉為「普世價值」、建基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價值觀，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已經被美國自己不斷侵蝕、否定和拋棄，而這套自由主義價值觀又一直以來是美國的軟實力的核心。

誠然，在很多方面特別在對待少數族裔、基督徒、弱勢社群和其他國家時，美國的自由主義在應用上並非一視同仁，而是以美國或者其當權者自身利益為依歸，因此呈現出虛偽、雙標和冷漠的缺陷。然而，作為一種「崇高」理想，這套植根於個人主義和人文關懷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對世界上不少人尤其那些受到西方文化薰陶的人有巨大的說服力。不少人也因此而對自由、平等、法治、人權、民主、包容、權力受到制約、多元化、自由貿易、市場

經濟、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等價值觀趨之若鶩。部分人甚至把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錯誤以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在美國內政和外交上全面準確落實，並因此對美國產生好感與敬仰。

長期以來，美國不少學者對外宣稱自由主義是美國的「唯一」或者「主流」的價值觀，而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是因為所有移民美國的人，無論他們原來的價值觀為何，最後都會因為服膺和接納這套自由主義價值觀而成為標準的美國人。

美國學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於1955年出版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一書在此可謂是經典之作。冷戰剛結束，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中更志得意滿地宣揚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歸宿，人類再也不可能再創造出一套更優越的理想和體制。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一段頗長時間內，美國的自由主義在全球思想領域獨領風騷，美國的軟實力也因此無與倫比。

然而，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價值觀、地區情況差異龐大、階級矛盾深刻，以及利益極為分歧的國家，要所有美國人都信奉同一套價值觀並不現實。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外來移民人數急劇增加，美國人在文化上的矛盾和衝突越來越尖銳、嚴重和激烈。文化矛盾和衝突又往往演化為政治矛盾和衝突。很多時候，美國人把文化矛盾看得比經濟或階級矛盾更重要，因此其文化身份認同比階級身份認同更能左右其政治和社會行為，而文化差異比利益矛盾亦更難調和與妥協。因此之故，在過去半個世紀，圍繞着價值觀差異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在美國愈演愈烈，有時甚至引發暴力衝突，因而嚴重甚至徹底撕裂美國的政治與社會。不少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已經爆發了愈趨殘酷、殺傷力巨大和難以結束的「內戰」（civil war）。

在這場文化戰爭中，自由主義受到各種各樣的非自由主義、種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威權主義等「逆自由主義」（illiberalism）極端思想的挑戰，但直到最近十年左右，自由主義仍然勉強處於上風，

因此美國人仍然可以吹噓美國乃自由主義的國度，而且仍然理直氣壯地向外推銷自由主義。不過，自從特朗普於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後，自由主義在美國的地位已經開始搖搖欲墜。但是，在特朗普的第一屆任期內，由於他缺乏足夠實力、人才和經驗去推行他那套逆自由主義綱領，所以對自由主義的衝擊不算太嚴重。

然而，當特朗普2024年再度成為美國總統後，他具備了相當的實力、人才和經驗去厲風行貫徹其「美國優先」的理念，並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由主義從美國政治和社會驅逐出去。

美國的自由主義和逆自由主義的文化戰爭在眾多不同的領域激烈展開。這些領域包括：宗教與世俗化、性別角色與女性主義、墮胎與生育權、性少數的權利、宗教在公共生活的角色、種族與身份認同、子女教育的選擇權、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移民、擁槍權與槍械管制和愛國主義與歷史記憶。

「自由主義」被美拋棄

今天，雖然美國社會依照價值觀的差異而高度分化，但美國學者對於如何按照價值觀而劃分不同的社會群體卻意見不一。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2004年出版的名著《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中認為，美國原來的民族認同植根於盎格魯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其中包括個人主義、法治、新教工作倫理和英語等價值。他認為，這種文化基礎在歷史上統一了美國，並使一種獨特的美國信仰（American Creed）得以形成。不過，隨着大量不同種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湧入，美國已經失去了一套能夠團結美國人的單一信仰，從而何謂「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也變得模糊不清。

另一位美國學者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其2021年出版的暢銷書《最後的希望：危機與復興中的美國》（Last Best Hope: America in Crisis and Renewal）則斷言，美國是一個不穩定的國家和一個分裂成交戰部落、暴力頻發的民族。他把美國一分为四，它們是「自由的美國」（Free America）、「聰明的美

國」（Smart America）、「真正的美國」（Real America）和「公正的美國」（Just America），這四個美國的人在重要價值觀上存在巨大的鴻溝和割裂。

特朗普以大多數選票再度成為美國總統，而其支持者又控制了國會兩院和最高法院，標誌着他們所代表的「逆自由主義」（一般被稱為白種人民族主義、右翼民粹主義、基督教民族主義、特朗普主義、「讓美國再次偉大」主義等）已經成為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而特朗普則按照「逆自由主義」的教條進行治國理政、重塑美國政治和社會以及推展外交政策。

特朗普所標榜的「逆自由主義」在美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為其所編製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中有充分的反映。簡單而言，這套「逆自由主義」的核心宗旨包括：（1）**民族主義和美國優先**：堅信國家主權、邊境管制和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反對全球主義、國際貿易協定和多邊組織；（2）**民粹主義**：對政治精英、主流媒體、學術界和建制機構深度不信任；（3）**反對政治正確**：拒絕「覺醒文化」（wokeness）等極端自由思想，支持傳統價值觀和法律秩序，強烈反對各種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4）**威權主義**：相信強大和自信的領導，支持擴大行政權力，反對三權互相制衡，強調安全、秩序和愛國主義；（5）**對政府懷疑和不信任**，特別是那個由職業官僚組成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6）**嚴格的移民控制和鼓吹種族主義**，維持白種人在美國的支配地位；（7）**基督教傳統主義**：支持基督教道德、傳統家庭和維護生命政策，反對墮胎；（8）**經濟民族主義**，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懷疑和主張政府介入經濟事務。

特朗普再度上台後，便急不及待地把文化戰爭推到一個新的和更高的台階、更廣闊的層面和更對抗性的境地，並積極利用行政權力來發動文化戰爭。他通過發布大量的行政命令疾風驟雨般重塑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與之相關的現象包括：總統的權力被不斷擴大並形成「總統霸權」；一些行政命令的合憲性可疑；政府不尊重法院的裁決；行政機關不受立法和司法機關制衡；大批被視為不認同逆自由主義、違反逆自由主義或者被認為不效忠特朗普的官員被辭退，包括軍人、外交人員、情

報人員和教育官員；一些被認為不合乎「逆自由主義」要求的部門被或將被裁撤，比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和聯邦教育部；一些部門的權責則被削弱、比如負責環境保護、監管工商業活動的部門；官員的進退以政治忠誠（political loyalty）而非能力為標準。

在社會上，特朗普粗暴地把大批非法移民遞解出境；企圖剝奪在美國出生的人的公民權利；試圖通過取消或減少撥款逼迫大學採取有違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政策；對中小學校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加強管控；歧視和打擊媒體的異己者；大幅減少對科學研究的撥款，尤其要終止那些違背逆自由主義信念的研究比如那些針對現行種族不公和性別差異的研究。

對外方面，在逆自由主義的引領下，特朗普悍然向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發動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激烈的關稅戰，脫離一些比如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不再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實行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霸凌主義，推行各種保護主義，不斷破壞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粗暴對待盟友與夥伴，覬覦別國的領土，侵犯別國的主權，削減對外援助等。

美霸權根基搖搖欲墜

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特朗普所代表的逆自由主義在國際上基本上沒有市場，作為一種理想也沒有號召力和感染力，甚至可謂是一種落後和野蠻的思想。它只有在一些國家的右翼勢力中才能找到知音。因此，當過去支撐美國軟實力的自由主義在美國也走向邊緣化的情況下，奉行逆自由主義的美國的軟實力在國際上急劇滑落便無可避免，尤其當不少國家又因為美國的逆自由主義主張、政策和行為而成為受害者。當然，對於特朗普而言，美國在世界上軟實力的多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是否可以憑藉硬實力（軍事和經濟實力）和政治交易而取得實際利益，況且美國也不打算向外輸出其逆自由主義。即便如此，我認為，逆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抬頭，代表了美國自身的衰落。特朗普肆無忌憚和粗暴行使政治權力去推行逆自由主義實際上也是在不斷動搖美國的全球霸權的根基，並讓美國在國際上走向孤立和不被尊重與信任。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對接中東產業機遇 橋樑作用助內企「出海」



議事論事
陳祖恒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率領商貿代表團訪問中東，筆者有幸代表生產力局參與其中，親身見證香港和內地就拓展中東合作機遇取得豐碩成果，也深深體會中東蘊藏的龐大機遇。筆者認為，香港可從多方面深化中東之行成果，更好善用香港高度國際化和「超級增值人」優勢，把中東機遇轉化成實際經濟動力。

在行政長官率領下，代表團先後訪問卡塔爾和科威特。卡塔爾是中東地區最發達國家之一，以去年為例，該國人均生產總值高達約7萬美元，位居海合會國家之首，擁有豐富天然和商業資源。位處於波斯灣中心的卡塔爾，屬區內重要的商貿、金融、創科和航空物流的樞紐，也是連接和拓展北非市場的橋頭堡。

我們一行拜訪了卡塔爾投資局、卡塔爾金融中心、卡塔爾開發銀行（QDB）等多個機構，共同探討雙方合作機遇，在各自領域廣交朋友。當中，拜訪卡塔爾開發銀行的過程，讓筆者印象非常深刻。

強化法定機構之間的協作

卡塔爾開發銀行是由該國成立的金融機構，主要職責為促進該國經濟多元化發展、支援中小企業發展和升級轉型、為企業提供貸款融資等金融業務，同時亦推動卡塔爾企業拓展海外市場、促進出口貿易、進行創業孵化等工作，等同把香港貿易發展局、工業貿易署、投資推廣署、生產力局等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部分職責集於一身，以單一機構形式推進卡塔爾經濟發展。

就此，筆者認為香港可根據自身情況，向卡塔爾開發銀行「取經」，建議政府可強化與經貿發展相關部門、法定機構或半官方機構之間的協調、統籌和合作，集眾之力、各司其職、優勢互補，共同攜手促進本港經濟多元發展，帶動法定機構呼應國家戰略、

與時俱進地發展。

第二，香港可繼續更好發揮高度國際化和「雙向跳板」獨特優勢，強化作為連繫內地和中東商貿發展、「出海」的橋頭堡。筆者於卡塔爾開發銀行的交流會上，推廣香港發展優勢，並深入講解生產力局工作，包括如何利用國際化服務和場景等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也與不少中東政商界代表交流和接觸，他們都看重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對於來港開拓業務，以至透過香港作為橋樑「出海」至內地及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具有濃厚興趣，也有當地機構表示有意與生產力局探討合作和對接。

筆者建議，政府未來可更主動出擊、多管齊下，把更多來自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的中東企業「引進來」。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具備「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在供應鏈管理、研發設計、開拓市場、技術對接、法律和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尤其是與工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都有世界領先實力和銜接國際的優勢，絕對可呼應中東、乃至北非企業和品牌對開拓海外市場的需要。筆者期望，當局可深化落實今次訪問中東所取得的成果，持續深化與當地機構和產業對接，識別有意「出海」的中東企業，提供適切支援服務、稅務誘因措施等，吸引他們進駐香港。

第三，協助內地企業和品牌「出海」至中東，是香港的強項和優勢所在，我們應把握好此優勢，強化香港的「國際窗口」功能，以「超級增值人」的定位為國家產業增值，為香港創造更多經濟增長點。

生產力局一直大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上月中更聯同中關村國際創新中心、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和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成立了「出海服務中心」。中東此行，行政長官到多哈哈馬德國際機場考察，了解該機場的自動駕駛車輛試驗項目的運作和成效。事實上，該試驗計劃由內地企業馭勢科技參與。而生產力局早前就與馭勢科技在技術支援、產品成型、應用落地等層面合作，提供「出海」服務，隨後馭勢科

技亦與香港國際機場合作，透過在機場應用汲取成功經驗，成功將技術推廣至國際市場，包括成功「出海」至卡塔爾作為試點，這正是香港夥拍內企「併船出海」、走向國際的好例子。

提升「出海服務中心」功能

筆者深信，在生產力局團隊的努力下，會繼續透過「出海服務中心」，助力內地企業與全球創科資源互聯互通，並利用香港的國際化應用場景，加速產品、技術出海，建立香港與海外生產基地或運營跨國總部業務，推動研發成果和技術轉化，邁向全球市場，冀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出海所需，而中東市場則是內企「出海」其中一個具潛力的目的地。

最後，筆者期望，政府繼續優化支援港企發展品牌及開拓中東市場的相關措施，協助企業握緊中東商機。隨着環球經濟形勢持續不明朗，不同行業和產業都希望開拓新市場、新商機，把握好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的大趨勢，中東不少國家的人口結構較年輕，近年消費力穩步增長，電商發展亦急速，對高性價比的品牌和產品有龐大需求，不少港企也劍指中東的市場優勢，希望將中國及香港品牌進駐當地，以品牌建設迎來新機遇。

以紡織及製衣業為例，筆者早前收到從事裁縫訂製的代表反映，指中東國家有很多高端、高購買力的顧客，希望政府助力他們進駐當地。筆者希望，政府可持續優化支援企業措施，包括強化出口信用保險局涉及中東市場的承保服務、探信能力，並提供更多免費的出口諮詢服務，擊破港企過往開拓中東市場所面對的痛點。

總言之，中東市場具發展潛力，筆者期望與特區政府和工商界繼續攜手，進一步延續和落實中東之行的豐碩成果，繼續發揮好「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助力國家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為香港各界創造更龐大商機，貢獻「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

立法會議員、生產力局主席

傳承抗戰精神 擔當代責任

2020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



議論風生
許小勤

北上創業或學習交流，積極參與深圳河套科技園、鄉村振興等專案。

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並強調「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八十年前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歷史豐碑。中華兒女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凝聚的抗戰精神，不僅是抵禦外侮的精神旗幟，更是激勵後世青年奮勇前行的力量源泉。無數青年點燃了「以青春之我，築青春之國」的信念火種，拋卻書本走向戰場，放下鋼筆拿起鎗炮，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以生命為墨書寫了永不褪色的愛國主義篇章。

歷史從未走遠，精神一脈相承。這種穿越時空的精神傳承，在當代青年身上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與使命擔當。今天的中國青年，在脫貧攻堅一線扎根基層，在航天發射場見證星辰大海，在科技前沿正以演算法創新推動醫療、工業等領域智能化升級，為產業變革注入智能引擎，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中國聲音。當代青年正以開拓創新為筆，在科技攻關、鄉村振興、社會服務中勾勒民族復興的畫卷。不同時代的青年，始終以奮鬥姿態續寫着抗日精神和五四精神的時代華章。

對於香港青年而言，抗戰歷史是最好的愛國教材。香港與祖國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抗戰時期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英勇事跡，改革開放中獅子山精神與國家發展的同頻共振，都展現了香港青年的愛國之情。在大灣區建設中，這種情懷轉化為具體行動，越來越多香港青年

這種「國家所需，青年所向」的主動奔赴，既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生動縮影，也是抗戰精神在當代的生動詮釋。

對香港青年而言，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歷史節點，賦予民族精神更深層的現實意義。銘記歷史不僅是致敬先輩，更要在複雜環境中堅定「國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這就是對抗戰精神最好的時代傳承。

特別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香港的獨特優勢日益凸顯，既擁有「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也有深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得天獨厚優勢，又深植家國情懷，熟悉國際金融、法制等規則。只要香港青年把個人發展置於國家經濟安全大局，把專業理想深植於民族復興偉業，以腳踏華夏厚土、眼觀全球風雲的戰略視野，在大灣區建設中找準坐標，讓個人成長與產業升級脈絡同頻共振，一定能發揮專業優勢並創造價值，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理想，大有作為。

「志之所趨，無遠弗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銘記抗戰勝利，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從歷史中汲取奮進力量。願每一位青年都能以史為鑒、不負韶華，這就是對抗戰先輩最好的告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在民族難關的支撐下，我們定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以發展破局、以創新制勝。

重慶市政協委員、就是敢言常務副主席